

责任编辑：刘 洵 助理编辑：孟海江
封面设计：唐瀚设计

通识课教育系列教材
“互联网+”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通识课教育系列教材
“互联网+”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通识课教育系列教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戏曲鉴赏
音乐欣赏
舞蹈鉴赏
影视鉴赏
艺术概论
大学美育
文学欣赏
书法鉴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主编◎周 妮 禹明华

主编◎周 妮 禹明华

ISBN 978-7-5121-5300-4



定价：49.80元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www.bjtu.com.cn>

通识课教育系列教材
“互联网+”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主编◎周 妮 禹明华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本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开篇，后着重介绍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生活、中国传统文学、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教育、中国传统科技、中国传统体育七方面关于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润物细无声地让学生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本书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既可作为大学生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人文素养的通识课教材，又可作为大众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入门读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 周妮，禹明华主编.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24. 7. — ISBN 978-7-5121-5300-4

I. K20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VY8452 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ZHONGHUA YOUXIU CHUANTONG WENHUA GAILUN

责任编辑：刘 洵

助理编辑：孟海江

出版发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话：010-51686414 <http://www.bjtup.com.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44 号 邮编：100044

印 刷 者：三河市华骏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 mm × 260 mm 印张：16.5 字数：341 千字

版 印 次：2024 年 7 月第 1 版 202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价：49.8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向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质监组反映。对您的意见和批评，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投诉电话：010-51686043，51686008；传真：010-62225406；E-mail：press@bjtu.edu.cn。

前言

中华文化是由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演化并汇聚而成的，是能够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思想智慧，凝聚了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亲近、理解、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践行中华民族精神，培育、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是现代中国人在追求中国梦和实现自我发展过程中应该具备的重要品格和关键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是党中央统筹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做出的战略谋划，对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大意义。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大学生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让大学生在教育实践中体验感悟，更好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认同民族精神，注重知行合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是广大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书着眼于全景式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培养理性的思考者、优雅的生活者、诗意的栖居者、高雅的审美者、问题的解决者、责任的担当者、终身的运动者为目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构建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生活、中国传统文学、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教育、中国传统科技、中国传统体育七大单元。本书在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深入挖掘其中的德育元素，将其有机融入“文化视窗”“文化漫谈”等模块，润物细无声，让学生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本书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在“文化视窗”等模块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传承意识和时代精神；在“业精于勤”“文化漫谈”等模块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要成果，旨在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批判思维，帮他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他们的人格修养；在“思维碰撞”“文化践行”等模块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让学生能活学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编者力求本书体例合理、内容新颖、文字规范，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存在疏漏之处，恳请阅读本书的专家、同行及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订，使之日臻完善。

此外，本书编者还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了服务于本书的教学资源库，有需要者可致电教学助手 13810412048 或发邮件至 2393867076@qq.com 获取。

编 者

目 录

第一单元	历史天空	003	主题一	薪火相传——传统文化历程
		021	主题二	背景透视——传统文化土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24	主题三	精神脊梁——传统文化精神
第二单元	理性思辨	035	主题一	治世之学——中国儒家思想
		047	主题二	治身之学——中国道家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	054	主题三	治心之学——中国佛家思想
第三单元	诗意栖居	063	主题一	岁月烙印——中国节日文化
		074	主题二	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传统生活	086	主题三	华夏锦裳——中国服饰文化
第四单元	人生映像	099	主题一	诗风雅韵——中国古代诗词
		117	主题二	世情描摹——中国古代小说
	——中国传统文学	123	主题三	曲苑风流——中国古代戏曲



第五单元	慧眼寻美	135	主题一	翰墨留香——中国古代书法
		144	主题二	妙笔丹青——中国古代绘画
	——中国传统艺术	159	主题三	千秋风韵——中国古代乐舞
第六单元	求学向善	169	主题一	选贤任能——中国科举制度
		176	主题二	黉门传道——中国书院文化
	——中国传统教育	185	主题三	止于至善——中国教育大家
第七单元	知术匠心	197	主题一	医者仁心——中国古代医学
		210	主题二	雕梁画栋——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传统科技	226	主题三	仰望苍穹——中国古代天文
第八单元	生命律动	241	主题一	落子无悔——中华传统围棋
		246	主题二	气吞山河——中华传统武术
	——中国传统体育	249	主题三	百步穿杨——中华传统箭术
参考文献		254		

第一单元

历史天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单元导语 ▶

我国是一个拥有 5 000 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星光璀璨的文明，确保了民族文化能够一脉相承。这种文明和文化，在空间上占地辽阔，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文化既有鲜明的个性，更有傲立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伟大气魄。回望人类历史，中华文化在众多的古老文化中脱颖而出，至今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确立国家、民族、社会、个人主体性的根本文化资源，更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应该引以为傲。

本单元主要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基本精神，旨在引导我们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学会从文化的视角观察、分析现实问题，亲近、认同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

学习目标 ▶

知识目标

1.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2. 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生条件及背景。
3. 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能力目标

1. 能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2. 能掌握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3. 能够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当代社会的文化现象。

素质目标

1. 培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
2.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文化视窗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重要元素，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对中华文化遗产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荣光。

主题一

薪火相传——传统文化历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结晶，是我们中华儿女精神家园的内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汲取智慧。”世界历史上各个民族或国家的每一次文化复兴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必须回到文化的源头上。温故而知新，汲取知识和营养后再前进，我们的文化才能绽放出灿烂的光辉。

欧洲的文艺复兴旨在复兴与弘扬其文化源头——古希腊文化。这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并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同样，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养，拓宽知识视野，筑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阵地，确认自己在世界文明中的“文化身份”，提升文化自信；同时，我们还要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激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决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对当代中国的青年学生来说，学习、领悟、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使命，也是担当。

“文”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义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化”的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区别于动物，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生活的总和，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等方面。狭义的“文化”，则是排除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有关物质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部分，即只包括精神创造及其成果，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我们通常利用和研究的文化，主要指狭义的文化。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和创造的文化。“传统”是指文化中具有世代传承的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思想文化、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宗教艺术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总和，具有时间上的历史性、延续性以及空间上的拓展性、权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指“文化”，还强调“文化”与“传



统”的结合。

在纵向探析中，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指中国从上古时代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文化；从横向来看，它主要指中国传统社会中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除儒家、道家等诸子学说外，还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门类，如艺术、法律、哲学、道德等，以及历史、地理、医药学、天文、农学等古籍文书。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可概括为“以中华民族为创作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点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文明演化并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的、内涵博大精深且传统优良的文化。

悠远浩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孕育产生到不断壮大，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一、上古：原始文化的产生

上古时代是指人类发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历史阶段，这一遥远的文化时期正是中华文化发端的阶段。

（一）中国人的起源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有了人，就有了历史，也就有了文化。因此，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国人的起源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1965年5月，考古学者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约170万年的猿人化石，将其定名为“元谋人”，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确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的直系远祖腊玛古猿的许多材料，以及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到晚期智人（新人）各个发展阶段的丰富材料被学者们相继发现。

古猿到人类之间的转变，是生命物质实现了质的飞跃的体现，而文化就产生于从猿到人的转变中。

（二）原始物质文化

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石料和经过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至距今约7000年的四川资阳人所处的时期均属于这一时代。

根据考古学者的研究，元谋人是否学会了用火这件事尚有争议。但北京猿人文化遗

址内已发现灰烬，出土了大量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石块、骨骼，甚至还有木炭。这一发现证明，生活在约 5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能熟练地使用火，并能有效地保存从自然界中取来的火。关于火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恩格斯有精辟论述，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如果说石器的制造使其他动物与人开始有了差距，那么，火的使用标志着人与其他动物产生了本质的区别。

从 10 000 年前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较为精致的磨制石器取代了粗糙的打制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内容。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三）原始观念文化

物质文化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华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的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的崇拜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1. 自然崇拜

对大自然的崇拜（如太阳、土地等）是中华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学者从仰韶、屈家岭、马厂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很多表现太阳图形的纹饰。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将军崖岩画、四川省珙县的悬棺岩画、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的沧源岩画、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的花山岩画等新石器时代岩画上，也出现了太阳神的形象。民间长久流传的“地母”之说，以及古文献中“郊祀社稷，由来久矣”的记载，则透露了先民对土地的崇拜。此外，太阳、土地以外的自然物，也为中华先民所崇拜，如《礼记·祭法》中记载的“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就说明了这一事实。自然崇拜对保护先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把自然物和自然力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能力的对象加以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当时的人们尚未形成明确的“超自然体”的观念，但已开始具有将自然物和自然力超自然化的倾向。

将人格化或神圣化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等作为崇拜对象，是自然宗教的基本表现形态。中华先民崇拜天、地、日、月、星、山、石、海、湖、河、水、火、风、雨、雷、雪、云、虹等天体万物及自然变迁现象，他们认为，这些自然现象有生命、意志、情感、灵性和奇特能力，会对人的生存及命运产生各种影响。因此他们对之敬拜和求告，希望它们帮助自己消灾降福。

自然崇拜与人的社会存在有着密切关系。人类原始部落群体因生活环境不同而具有



不同的自然崇拜对象及活动形式，人们一般都崇拜对本部落及其生存地区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影响最大的自然物和自然力。自然崇拜具有“近山者拜山、靠水者敬水”的地域特色，反映出人们对风调雨顺、人畜平安、丰产富足的实际需要。

2. 生殖—祖先崇拜

中华先民对于自身的繁衍非常关注，由此产生了强烈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省牛河梁和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在甘肃省、陕西省、河南省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都展示了先民们对生命崇祀的庄严情感。

生殖崇拜源于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包括对女性和男性的崇拜。女性被先民认为是繁衍的决定因素，因此，先民把女性看作创世神、始祖神加以崇拜。后来，随着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先民便转向了男性崇拜。

原始人由于不懂得人类生殖的原理，见到妇女腹中能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便认为其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同时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就是创造生产力的全部力量，人口的多少、体质的强弱决定氏族或部落的兴衰，所以人们对妇女分娩十分重视。每当有妇女分娩时，部落中的群体都要举行隆重的祝祷仪式，并将妇女带到野外去分娩，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土地肥沃。如果妇女因分娩而死（这在原始社会是经常发生的），那么部落群体就要为死者举行葬礼。古代许多国家都有生殖之神，如古希腊的生殖之神为普里阿帕斯；中国古代的生殖之神多为女性，如送子观音、送子娘娘等。

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男性在生产中的地位便逐渐提高。

6 000 多年前，即神话中人祖伏羲生活的时代，也是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相传伏羲一出世就神奇异常，长大后聪明过人，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受到人们的拥戴，成为部落首领。他带着人群，沿黄河游牧东下，在富饶的宛丘（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定居下来，建都治天下。

伏羲有十大功绩，其一就是婚配夫妻。婚配的方法是，每年仲春之月，部落打破氏族的观念，在会场中间放一块带“窑（孔）”的大石头，用“会”的形式，把男女青年召集到一块。男女若互相有意，就用手摸摸“窑（孔）”，这说明两人有了感情，愿成为夫妻，便可以把婚姻大事确定下来。从此，人类结束了群婚和族内婚的历史，太昊陵二月庙会也由此延续下来。太昊陵自有陵以来便有了“子孙窑”，民间有摸子孙窑可以多子多孙、子孙健康的传说，这个传说一方面反映了早期社会人类的生殖崇拜，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近亲结婚的弊端早有认识。

3. 图腾崇拜

与自然崇拜和生殖—祖先崇拜相比，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在原始思维中，类比和联想是主要的思维方法。中华先民一般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或植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并将这种动物或植物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崇拜。

神话传说和考古研究中都有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相传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这六兽其实是指以这六兽为图腾的六个氏族。鱼、鸟、蛙、龟、蛇、猪、马等实有自然物，以及人们运用抽象的、概括的思维能力创造出来的对象，如龙、凤等，都曾是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物。

在中华先民的信仰中，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自己与某种物种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产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中华先民认为自己的祖先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有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物或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

这种原始宗教观念是原始时代观念文化的主流。在原始观念文化中，原始艺术也有一定的发展，其主要艺术形式是原始彩陶、原始陶绘、原始雕刻、原始岩画。

（四）原始社会组织

人在世界中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间的婚姻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氏族关系的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

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婚姻关系上经过了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婚等阶段，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经过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阶段。大致说来，母系氏族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社会则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开始萌芽。传说中的“五帝”，便生活在这一时期。关于“五帝”的组成有多种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位上古帝王。

氏族制后期，部落联盟产生。部落联盟的首领推举方式就是著名的“禅让”。传说，尧在位七十余载，在他衰老之际，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肖（品行不好），看中了贤孝而有才的舜，他对舜进行了多方考验，最终“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舜到暮年，亦仿当年故事，将首领之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

禹的时代开启了今天已初显轮廓但尚有争议的“夏文化”的进程。依据考古发掘和零碎的文献资料，夏文化大致具有如下特征：①工具形态由石器、陶器过渡到青铜器；



②农业生产已有巨大发展；③私有制确立；④建立了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由此，文明社会的曙光在中华大地上初现。

二、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从人猿分别、文化发端，到传说中的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史记·夏本纪》），中华文化在自身的生命运动中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然而，中华原始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方式、婚姻演进方式、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包括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在内的精神生活，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大体一致。直至殷商和西周时期，中华文化的特殊面貌才开始形成。

（一）殷商神本文化

有说法称，商族发祥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族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第十代君王盘庚的率领下，从奄（今山东省曲阜市）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在此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

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族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族人率先“有册有典”。这些由掌理卜筮和记事的“贞人”书写与保管的典册，便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一批文献。这些文献虽然“佶屈聱牙”，散漫无序，但其间已包含丰富的文化思想。文字、典籍、青铜器，以及“殷”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都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

（二）周朝的文化维新

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来说，周王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统治办法，一方面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周王确立的宗法制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机体。汉代以后的宗法制度虽然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依然维系了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华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肇始于西周。

周朝的礼制是周朝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等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周朝人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

范着古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创制于西周。

（三）夏商周的文化成就

夏朝就已经有了历法，今天的农历又叫“夏历”，来源于夏朝。到商朝时，历法逐渐完备。人们将一年分为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闰年增加一个月。商朝的历法中还有对于农事的安排，告诉人们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等。夏朝的古书记录了我国最早的一次日食。

在医学方面，商朝的古书中记录了16种疾病。商朝有关虫牙的记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牙病记录。商朝的名臣伊尹也是一位名医，他发明了煎药，首创用汤药治病的方法。商朝的外科医生已经能够使用手术刀一类的器械。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座商朝墓葬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漆盒，里面装有一件形似镰刀的工具。专家认为这件工具是用来切腐肉、肿瘤或放血的手术刀。到周朝时已经出现了医学分科，如内科、外科、营养保健科和兽医科等。

在青铜艺术方面，商周的青铜器上有各种动物的形象，这些形象造型美观，生动逼真。商朝的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工艺高超，是青铜器中闻名中外的精品；商朝的玉器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的一对玉象，形态逼真，活泼可爱；商朝的青铜礼器最有价值，如后母戊鼎。

在音乐和舞蹈方面，夏商周几代都很重视。传说中舜作的《韶》在夏朝盛行，这是一种既可歌唱又可伴舞的音乐。在商周时期，乐器已有不同种类，如打击乐器钟、磬、鼓等，西周时则有了成套的乐器。夏商周时期的代表性音乐有表现大禹治水的大型歌舞《大夏》和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

在文字方面，商朝甲骨文和商周时期金文的出现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又一大发展。

三、春秋战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据《孟子·离娄上》记载，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然而，在这充满血污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却有了辉煌的乐章。

（一）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之所以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为各个阶级、各



个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中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使其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加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的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使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益增大。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为文化重组提供了机会。竞相争霸的列国诸侯尚未建立统一的观念形态，加上学术环境宽松活泼，文化人可以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条件。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势恢宏的“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百家兴起及其学派特征

“百家”是对诸子蜂起、学派林立这一文化现象的概说，对于其间的主要流派，古代史学家也多有论述。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继承方式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视血缘关系和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汉代以后，儒学虽几经变化，但始终保持着一贯的礼教德治的精神，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班固在《艺文志·诸子略》中这样记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提倡强化法令刑律，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法家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法，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倡导“尚力”“节用”“兼爱”“非攻”，其学派中的人多为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

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人物，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等人，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开创学派，编撰“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了纵横八极的理论。

四、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公元前 221 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秦王朝。秦王朝统治不久，便因统治政策的失误而被农民起义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汉朝。

（一）宏观的文化精神

秦汉王朝具有宏大的规模和气象，秦汉的兴盛根植于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的新兴地主阶级。由统治阶级的精神状况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观照历史的《史记》，无不是在秦汉时期宏阔的文化精神的统摄下诞生出来的辉煌产物。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秦汉时代，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交流活动就是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国的产品通过丝绸之路抵达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给中华文化增添了多种多样的色调和光彩。

（二）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

秦汉统治者在一统天下的同时，还致力于统一思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雷厉风行地扫荡种种差异，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其施行的重要措施有如下几个。

（1）书同文。秦始皇下令命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与统一工作。李斯以周朝大篆为基础，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秦篆”。

（2）车同轨。秦始皇规定车辆宽度为 6 尺（1 尺 $\approx$ 33.33 厘米），统一车辆形制，使一车可通行全国。与此同时，秦始皇调派民夫，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畅通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3）度同制。秦始皇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结束了战国时各国货币、度量衡标准制度混乱的局面。

（4）行同伦。秦始皇“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以此统一人们的文化和心理。

（5）地同域。秦始皇废除了周代以来的封邦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通过大规模



的移民、开发边境地区来传播中原文化。

秦始皇统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但在客观上也有力地增进了秦王朝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国后期，诸子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都是出于这种尝试而创作的作品。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 239）的《吕氏春秋》更系统地展示了这种思想。《吕氏春秋·不二》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遏制了战国时期以来蓬勃自由的学术氛围。

西汉时，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禁绝异端，发扬帝王“大一统”的意志。董仲舒以“六经”为核心，“崇儒更化”，寻找到了一种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君主政体比较吻合的文化形态。董仲舒“独尊儒学”的主张不仅被汉武帝采纳，推行于当世，而且在汉朝至清朝的两千年间行之久远。

（三）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推行，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

西汉统治者既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又立“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随后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汉武帝以后，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但是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爆发出今古文之争。

五、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使摇摇欲坠的汉王朝崩溃瓦解，一场近 400 年的战乱由此展开，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更迭如走马灯般令人眼花缭乱。在全国范围内，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之而起的西晋国祚短促。西晋灭亡后，战乱与割据随之而来，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在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替。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地向多元发展的局面。

（一）玄学崛起

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自从西汉后期儒学被定为“一尊”，由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杂糅搭配而成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成为帝王巩固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础。与此相辅而行的是对儒家经典进行种种烦琐解释的“经学”。

随着东汉王朝的没落，经学所蕴含的这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论的神圣光环逐渐黯淡，经学也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烦琐学问。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社会大动乱更有力地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的，其宗旨是“贵无”，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在主体面貌上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两汉儒学着眼于构建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玄学却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玄学却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道教创制与佛教发展

玄学的兴盛体现出动乱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教与佛教兴盛的基础。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嵩山道士寇谦之和庐山道士陆修静借政权之力清整民间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借此统一了各道派。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上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道教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讖纬家（讖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那里充分汲取思想资料，其在神仙世界的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本源。

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间传入中国，但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的人们只把它看作神仙方术。自三国时期开始，中国有了最早的出家人，佛教逐渐由上层发展到民间。

魏晋时期，士族大力推崇玄学，佛教学者开始把佛教语言与道家思想结合，使佛教本土化，即用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般若（佛经用语，意为智慧），消除了文化交流中的隔阂。此后，佛教开始在上层社会中广为流传。

至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普通民众希望在佛教中得到解脱。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大力发展佛教。可以说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佛



教的兴盛还表现在建造寺宇、凿窟塑佛方面，如大同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道教的勃兴与佛教的发展使社会层面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三）魏晋南北朝文化成就

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在文化艺术领域也有突出表现。

1. 书法艺术

东汉末年，书法逐渐成为一门艺术。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开始把字体由隶书转化为楷书。东晋的王羲之对楷书、行书、草书无不擅长，被后人尊称为“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丧乱帖》等都是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北魏时期，刻在石碑上的书法被称作“魏碑”，也是流传千古的艺术作品。

2. 绘画艺术

东晋的顾恺之被世人评价为“三绝”——“才绝”“画绝”“痴绝”，被画界尊奉为“古代画家四祖之首”。顾恺之的画作具有线条优美活泼、人物传神的特点。他的传世名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梁朝的张僧繇则擅长人物故事画及宗教画，创作了大量的寺院壁画。

3. 石窟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艺术主要用于宣扬佛教文化，如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武周山西麓，开凿于北魏前期，现存的 50 多个主要的石窟的石壁上雕刻了约 5 万个佛像，以及若干飞天和供养人，还有许多飞鸟异兽、楼台宝塔、树木花草等浮雕图案。这些石壁上的浮雕都是雄伟精巧的艺术品，不仅继承了秦汉以来我国的艺术传统，也吸收了外来佛教艺术的优点。

六、隋唐：隆盛时代

公元 7 世纪，世界局势并不稳定，这一时期的东亚大陆上，杨隋和李唐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的隋唐大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华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宏、如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一）“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以强盛的国力为基础，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隋唐文化首先

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徵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学艺术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化，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决不推行“文化偏至”。这样一种文化政策基本上为李世民之后的唐朝统治者所继承。对待文人，唐王朝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姿态，使得诗人作诗也少有忌讳。

隋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上。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欧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甚至马球运动等，如同“八面来风”，从隋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入。首都长安成为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是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隋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被当成卓越范例。所谓“有容乃大”，隋唐文化超越前代的特有气派，是隋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二）风采辉煌的艺术成就

隋唐时期的艺术规模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强盛。隋唐文化以宽容和摄取的态度，造就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

1. 诗歌与散文

中国文学的首唱是诗，而中国诗的辉煌巅峰则在唐代。清代文人编著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 48 900 余首，涉及的诗人有 2 300 多位。唐代的天才诗人们创作出了“无体不备，无体不善”的中国古典诗歌。

唐代的散文也有丰硕成果。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对中国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韩愈的《师说》《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

2. 书法艺术

与中国诗的历程几乎一致，唐代也是书法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篆书圆劲、草书飞动、行书纵逸、楷书端整。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四大家将唐代楷书推至登峰造极的地步。颜真卿的楷书具有字体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的特点，被世人称为“颜体”。颜真卿著名的碑帖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等。在颜真卿之后，有卓著成就的是柳公权，他把横竖划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柳体”。柳公权的楷书碑帖有《玄秘塔碑》《神军策碑》等。后人对颜柳风格，将二者合称为“颜筋柳骨”。



3. 绘画艺术

唐代也是绘画的极盛时期。“画圣”吴道子改造传统线描技巧，大大提高了线条的表现力，丰富了线条的美感。在画科上，唐代绘画也是全面发展：人物画辉煌富丽、豪迈博大；山水画的金碧青绿之美与水墨画的清修雅淡之韵交相辉映；花鸟画也登上画坛，初具规模。

中华文化发展至唐代，显示出了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七、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

爆发于755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唐王朝统治下潜藏已久的种种危机。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地国有制——均田制的崩解，使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并逐渐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相呼应，中华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奔腾着昂扬的生命活力。唐昭陵中雄壮健伟、神采飞扬的“六骏”古雕，透露出强烈的民族自信。而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样式，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社会风气，都在不同程度上浸润着宋型文化的特有风貌。

（一）理学的建构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理学的建构。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代儒家学者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格物”到“致知”，其实质是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

（二）士大夫文化的雅化

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与含义阔大、形象众生的诗不同，词小而狭、巧而新。它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要眇惆怅，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尽管宋代词坛还有别具一番风貌的歌唱，即由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宋代的这种主流词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代文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

宋词雅，宋画也雅。苏轼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

两宋文化的其他领域也无不表现出与宋词、宋画相通的风格。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文人赏玩的瓷器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宋代的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

（三）市民文化的勃兴

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起了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另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在市井中盛行的歌舞小戏。一些记载描述，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中出现了市民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

（四）教育、科技的发达

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一是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等级差别不断缩小；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人称“学校之设遍天下”。

在中华文化趋向成熟化、精密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在宋代亦发展至极盛。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武器三项重大技术创造是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北宋贾宪、南宋秦九韶在数学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贡献。

宋朝时期，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都有了绚烂的成就。宋代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两宋来都大为逊色。

八、辽夏金元：冲突、融会与交流

宋文化细腻丰满，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受到外患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受战争影响，这个时期各民族的文化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与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无一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同时，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也从汉族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在辽国，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汉族文化名著被译成契丹文字，广为流行。

13世纪，从蒙古高原席卷而来的成吉思汗“旋风”震荡着欧亚大陆。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蒙古上层贵族的争斗中获得胜利，登上大汗宝座。1271年，忽必烈取儒学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

（二）抗争与融会的文学创作

元朝时期，士人文化被打压，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路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的文人开始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联系。他们投身于杂剧创作，表达那个时代深沉的悲愤、苦闷与抗争。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鲁斋郎》等，都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郁闷与愤懑之情。

元杂剧的创作者们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被誉为“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就是表现这种情感的代表作品。在《西厢记》中，王实甫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美的艺术结构展现崔莺莺与张生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及理想终成现实的愿望，而且高呼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三）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

元代的驿道路网打通了元朝首都与亚欧各地的联系，为东方和西方旅行家远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275年—1292年，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南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足迹。这位意大利人回国后口述见闻，他人根据其口述经历，写成《马可·波罗游记》。书中，他用梦幻般的语言向西方人描述中华大地的美丽、富饶和繁荣。从此，东方的中国成了西方人心目中遥远的梦。

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于此，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取阿拉伯天文学成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授时历。

在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中华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的火药、

印刷术，以及中国历法、中国数学、中国瓷器、中国茶、中国丝绸、中国绘画、中国算盘亦通过不同途径，在亚欧地区广为传播，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更加辉煌灿烂。

九、明清：沉暮与开新

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处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农耕经济普遍发展，庶族地主力量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使传统的地权占有形式发生变更；租佃关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现，永佃制、押租制的发展，雇佣关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过渡，使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解；与此相关联，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凡此种种，皆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阶段。

（一）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化专制空前严酷地钳制着思想文化界。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统治者推行“崇正宗、灭异端”。朱元璋多次诏示，士人必须“一宗朱子之书”，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上也不遗余力。乾隆年间，统治者推行了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使中华文化遭受了巨大浩劫。

（二）早期启蒙思潮

明清两代的文化特点：一方面，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出现了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独尊地位的王阳明，虽然就其根本意旨而言是要修补朱学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应明中叶以来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的变迁，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了对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的阐释，从而否定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这形成了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王明阳的思想学说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

明朝中后期市民文学的兴起，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某些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与明朝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跃进。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总结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时期。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



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的字典；《四库全书》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象征，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

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的经验 and 成果；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整理与考据。

（四）西学东渐及其中断

明清时期，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他们在中国传播宗教神学的同时，也将近代的世界观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成就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了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遗憾的是，由于宗法专制下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以及伦理型文化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大门逐渐被关闭。

明清两代正处于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统治者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亚欧大陆的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式”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被裹挟在其中。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华文明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业精
于勤



司马迁《史记》之《五帝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中华书局，2019年版。

主题二

背景透视——传统文化土壤

自从中国迈过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华文明已存在了五千多年，传播范围纵横数万里。无论是王朝更替还是战乱频繁，无论是外族入侵还是自然灾害，都未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这与中华文明的生成背景有着直接关系。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是一个地域宽广的、半封闭的、处于暖温带的大陆型国家，有着农耕型的经济结构以及不同于中世纪亚欧等级制度和印度种姓制的血缘宗法制的社会结构。这些既构成了中华文明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又决定了其独特的文化特性。

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人类文化的发展史表明，地理环境是历史文化赖以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

影响文明延续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所处的地理条件。例如，古埃及文明地处尼罗河流域的周围，此处是大片的沙漠，人类能够生存的地方有限，因此族群之间为争夺生存居住地而频繁发生过于残酷的斗争。他们无法依靠地理环境来帮助自己抵御外敌，最终走向毁灭。而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东临茫茫沧海，西靠高山大漠，西南山高水险，疆土广袤，平原辽阔。这种一面临海，其他三面与域外陆路交通极不便利的地理环境，加上明清后期屡屡出现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不仅使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对阻隔，造成了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也造就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定式。这种地理环境和心理定式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相对良好的气候条件，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文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种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里，人们适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方式，也养成了相对温和的性格和安于现状、缺少竞争的心理。

其次，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明形成了自发性、独立性和一贯性的特点。尽管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和不同的民族有过多次冲突与融合，但其脉络却不曾中断。中华文明的融合和吸收铸造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念和文化心理，使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自成体系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中华文明衍生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中国”一词的内涵就是中国人富于尊严感的“自我意识”的具体表现。

最后，这种偏居一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保护反应机制”。历史上虽有外族入侵，但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宽广的地理环境使中央王朝纵使丧失了部分国土，仍有许多退路可供回旋。所以只有中华文明在吸收消化周边和外来文化的同时，还始终



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和系统的完整，并使之绵延不绝，具有超常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华文明进一步带动着东亚文明的发展。

二、农耕型的经济模式

人类古代的经济模式大致不外乎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型和商业型文明内部资源供给不足，需向外寻求，其特性为侵略性；农耕型文明可实现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其特性为和平性。

中国地处东亚，幅员辽阔，虽然耕地面积较少，但泥沙冲积形成的肥沃平原，以及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给中原大地带来了充沛的雨水，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得天独厚的气象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中华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模式。

自先秦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将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本，重农抑商成为社会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流思想。在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里，商人是受重视的。中国的传统社会，将民众按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士通常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两个行业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人们往往以出身于“耕读世家”为荣。读书人虽然不亲自耕地，但一般出身于地主家庭。家庭的兴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士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要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思想。再加上他们受过教育，使他们得以表达农民自己没法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就会以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呈现。

历朝历代把重农作为治国之道。以农立国的国策、农耕工具的改造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大大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中华文明中的务实精神、中庸之道、尚农与重农思想、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等，都与这种农业经济背景相辅相成。因此，中华文明是在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

三、宗法制的伦理社会

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的一种制度。所谓宗法，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规定嫡庶系统的法则。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宗法建立在宗族的基础之上，宗族又由若干个同血缘的家族集合而成。在宗法制度下，家族—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统治和服从为内核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共同体，它对国家与社会具有维系秩序的功能，同时，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也有深刻的影响。

在古希腊，伴随着人们跨海的移民浪潮，不同种族的人出于利益驱动，打破了原有

的血缘纽带，出现了杂居和债务奴隶。传统上基于血缘关系的氏族贵族统治日趋弱化，城邦式的国家随之产生。

中国几千年来沿袭的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农业模式。国民的主体——农民大多稳定地聚族而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强化了安土重迁及服从权威的国民心理。宗族为了加强团结，就将宗族血缘意识作为一种天然的纽带保留了下来。由血缘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被世代代保存了下来，土地转化为贵族专有，首领转化为地方官员，族人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宗庙祭祀制等制度的陆续确立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模式。中国的社会制度可以被称为“家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是通过家族来理解“国家”这个概念的，“天下家国，本同一理”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文化漫谈 ◆ 家国同构的体制特征

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缘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

家庭组成家族，家族组成宗族，宗族结成乡社，最后构成国家，所以说“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无论是最小的国，还是最大的家，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要求对最高权力者尽忠尽孝。如董仲舒提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对此的一个写照。而“忠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也说明了对家长的尽孝和对君主的尽忠是相通的。这正是家国同构的一种体现。

从先秦至明清，尽管社会形态有所变化，但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却长期沿袭未变。为维护这种组织形式，统治者严格规定了辈分、嫡庶、长幼、主从等等级秩序。宗法等级的“合法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倾向，这种偏重道德的价值取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

业精
于勤



司马迁《史记》之《高祖本纪》《陈涉世家》《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2019年版。



主题三

精神脊梁——传统文化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指那些长期受到人们尊崇的、影响着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不断相互凝聚和整合彼此的思想观念和固有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体现了民族精神的历史性与民族精神的特质。

一、以人为本的人本精神

人本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对象和中心的文化精神。与古希腊、古印度的文化相比较，中华文化中神本主义始终不占主导地位，人本主义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的人本主义与西欧的人文主义相比，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对人的理解。用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对于人的理解，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用中国的观点看西方对于人的理解，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没有形成一种社会的人格。将东西方的观点合而为一：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社会群体的一员。这也许是更合理的观点。通过比较中西方对人的理解的差异，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文化特征。

（一）在现实人生和鬼神上帝认知上，中国人重人生轻鬼神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神本主义始终未居于主导地位。西方古典文化是神本主义文化，有着十分突出的宗教精神。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人类精神以神话和宗教为开端，而宗教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人们对超自然神灵的顶礼膜拜与狂热信仰，帮助人们解决现实中的痛苦和对世界的迷惑。在人类封建时代，许多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哲学代替了宗教的职能，但同时将理想境界与现实人生统一起来，通过内倾路径而非外向路径，实现了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统一。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通过道德修养和实践来实现自我提升和精神超越，从而体现了对现实人生的重视。

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大都强调积极的入世主义。孔子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认为人的首要任务是了解人生的道理，做好现实人生的事情。老子用“道”架空了当时十分盛行的“上天”观念。其后出现了许多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不仅排斥宗教，而且对宗教的有神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无神论和唯物论的传统，给人本主义、理

性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在《神灭论》一书中，针对当时佛教所宣扬的“灵魂不灭”和“因果轮回”，提出了灵魂与肉体不可分离，精神依附于肉体的观点。其后，历朝历代都曾出现大力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家，比如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张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他们都认为神是臆想的结果，神不是力量的来源，宗教迷信没有存在的理由。

虽然中国社会中也一直存在着宗教信仰，但这种宗教信仰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首先，古代中国人仍然把入世作为人的归宿。中国人迷信的“天”“命”，同入世密切相连。西周时期出现的“敬德保民”思想便体现出了人们认为“民心”比“天命”更加重要，“民心”可以决定王朝的盛衰。中国的宗教信仰不通过否定现在来达到永恒的彼岸世界，即一些宗教中所谓的“天堂”。其次，无论是秦汉以后道教的逐步建立，还是后来佛教、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这些宗教从未凌驾于现实政权力量之上。最后，无论是中国自身的宗教，还是传入中国的宗教，都有浓厚的人本精神。中国道教与世界上其他宗教不同，道教没有把人的灵魂与肉体截然分开，也不把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完全对立起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深受人文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现实生活。比如代表中国佛教的禅宗，就提出了“顿悟成佛”“人性即佛性”的思想，因此在中国佛教中既有出家的和尚，也有不出家的和尚。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注重现世的人生。这种重人生轻鬼神的思想，使中华文化表现出了充分的人文主义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全民族的宗教迷狂，把人的眼光拉向社会，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当中世纪欧洲文化在基督教神学笼罩下出现生命力萎缩时，中华文化却显出了勃勃生机。

（二）在整体和个人孰轻孰重的理解上，中国人重整体轻个人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把人的目光从对神的关心拉回到对人自身的关注，强调个人的价值。西方人赞美个人，把人生的意义看作对本能欲望的满足，他们认为个人具有独立的地位，与整体是对立的。

受宗法制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人类的价值、人类的尊严、人类整体性。中国人不主张满足个人本性的欲望，强调个人应该严格服从整体，并且始终以人的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把人放在一定的政治伦理关系中加以考察。

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每一个人从诞生时起，便进入了一个“五伦社会”关系之中，即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兄弟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有其行为典范与道德模式。每个人都要在这样一种人伦关系中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履行自己的责任。这样的社会文化更重视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和责任，而对



个人精神的自由、独立与个体自身的权利并不十分重视。在这里，“人”是“道德的主体”。一方面，个人必须担负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个人又要追求一种主体道德心性的完善。这既是社会的要求，也是个人的自觉。

总之，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强调人对整体的义务和责任。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本精神有其合理性，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能增强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但这种文化精神由于忽视了个体的独立性，把人束缚在等级隶属关系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性的解放。

（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强调“天人合一”

西方人文主义认为，人不仅应当独立于神，而且应独立于自然，人与自然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

在是互为包含的。人化于自然之中，自然也融于人之中。这种观念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说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一观点大致上可以分为五类学说：孔子的“天人一德”说、老子的“天人一体”说、孟子的“天人一性”说、董仲舒的“天人一类”说、二程和朱熹的“天人一道”说。这些学说既强调天是万物的起源，同时又强调人事的作用，因此，“天人合一”带有一些宗教神学的性质，也具有劝谏皇帝和考核官员的作用。凡是出现异常的自然现象，统治者都会借此来考核官员，士人也会通过天灾来警示皇帝。从儒学的实践看，“天人合一”思想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的同时，也成为儒家学派解释历代制度的理论依据。

总之，“天人合一”文化精神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系统，这种观点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有其合理性；“天人合一”思想也有利于促进封建统治者清正廉洁、仁政爱民。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把自然和人类看作相互融通的东西，不区分二者的界限，这既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改造，又影响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真实了解。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华文化与中国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华文化的主流精神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可以追溯到《尚书》和《诗经》中，这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自孔子开始，就主张人生应该采取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态度。在孔子看来，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君子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

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他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后人不断奋发向上。

孟子从人格修养出发，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荀子则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断。《周易》中对刚健的思想进行了概括性的表述，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体运行，永无停止，君子应效法天，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去实现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并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个体人格的完善境界。由汉至清，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中的主导精神。

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发展。这种精神让士人怀揣建功立业的壮志情怀，外族入侵时，将士才能够不屈不挠地进行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斗争；人们遭遇人生挫折时，才能够被激励，奋发向上，坚定不移地继续奋斗。

三、厚德载物的伦理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倾向。对伦理道德的崇尚、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模式以及对家国一体的宗法体制的认同，深深植根于古代中国人的灵魂中，流淌在古代中国人的血液中。因此，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以德治国”，将道德感化作为统治民众的主要手段，用道德规范“教化”民众，规范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如孔子主张“治国以礼”“为政以德”，孟子强调“不忍之心”“行王道施仁政”。这种将伦理道德思想与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在历史上曾经起到驯化人心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伦理义务，要求个体服从整体，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的利益，并将仁义作为道德价值取向的内核。因此，“立人乃仁与义，处世则柔与刚”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道德信条；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父慈子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氛围；敬老爱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变的文明规则。

这种道德崇尚和道德实践对中国人的人格追求产生了深刻影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追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文关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人格精神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四、贵和尚中的合和精神

“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



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贵和”思想，往往是和“尚中”之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和同之辩”。《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的史伯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联结起来，使其配合而达到平衡，这就叫作“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把“和”与“同”的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表现了“重和去同”的价值取向。

《易传》高度赞美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太和”的观念，“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即至高无上的和谐，是最好的和谐状态。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还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人心向背，看作统治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以中为度，中即和。孟子认为提倡“贵和”思想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社会各种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调和，使冲突的各方兼容并包、和平相处、相互调剂。注重和谐是中华文化的特征。

和谐是中华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传统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但是，和谐不是消灭矛盾差别，而是在承认有矛盾、有差别基础上追求和谐，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传统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思想，表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譬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等。当然，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论语·学而》提到“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的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参与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的理念极其深入人心。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文化漫谈 ◆ 太极图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太极图内涵丰富，至少表达了三层含义。第一，任何一种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两个对立面互相包含，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两个对立面的协调吻合，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些含义中以第三个最为重要。它告诉我们，在统一体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都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因此也有利于自身。故人类与自然、人类与人类之间都应当追求“和”，在和谐之上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打造“双赢”局面。

五、饱蘸深情的爱国精神

宋代诗人陆游一生都在为国思虑，临终前还写下了“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诗句。像陆游这样爱国的中国人成千上万，不胜枚举。从屈原的上下求索到杜甫的凭栏涕泪；从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到文天祥的“留取丹心”；从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爱国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沉淀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浇筑了一座又一座历史丰碑。它成就了中国人的伟大人格，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正是凭着对国家、民族的深情厚谊，凭着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熔铸而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才经受住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一直保持着勃勃的生机。

六、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历来重视实际，深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崇尚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追求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这种务实精神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一种非宗教的文化。它既不寻求彼岸世界，也不探究虚无境界，而是立足现实人生，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无论是儒家主张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还是法家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反对“前识”，或者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都是求真务实精神的表现。

尤其是儒家主张的“经世致用”，强调的正是关注现实的务实精神。“经世致用”这一主张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落脚点，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体都是入世型的。做学问是“笃



行之”，修史是为了察古知今、鉴戒垂训，写文章强调“文以载道”等。正是在这种以解决社会、人生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经世致用”治学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科学也成为实用科学，天文、地理、数学、医药、农学、水利乃至四大发明，大多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科学。这些实用科学的成就之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之强，曾在世界历史上遥遥领先，令人叹为观止。

业精于勤



1. 余秋雨《中华文化课》，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
2.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德行》，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

单元实践活动

思维碰撞

竞争是个体或群体间力图胜过或压倒对方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在面对竞争时，有人问：“竞争就是你死我活，体育竞赛冠军只有一个，怎么能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求职竞争需要的是表现自己，争取别人的了解，推销自己，而不是谦虚，谦虚只能导致竞争的失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传统的价值追求（如谦让等）受到了挑战。请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一场辩论赛，并扫码填写辩论赛记录表。

正方观点：求职竞争中可以践行传统道德。

反方观点：求职竞争中无法践行传统道德。



辩论赛记录表

文化践行

分组收集近期新闻，为新闻中反映中华民族伦理思想的事例贴上标签，如“孝道”“尊师重教”“爱国主义”等，将小组成果制作成课件并在班级内展示，共同讨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活动结束后，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对本次活动的成果进行评价，并扫码填写文化践行评价表。



文化践行评价表

